

再詮釋達爾的民主思想： 一個另類觀點*

陳宜中**

摘 要

本文重新詮釋羅伯·達爾 (Robert A. Dahl) 的民主思想從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三階段發展，並提供一個有別於其他版本的「另類觀點」。第一節回顧達氏思想在學界所引發之種種爭議和各類詮釋觀點；第二節檢視他早年對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看法，及其幾項核心主張如「市場社會主義」和「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control)等；第三節申論五、六十年代達爾的「多元民主」典範乃是對熊彼得 (J. A. Schumpeter) 所倡議之「競爭式精英民主」理論的一個發展與修正；第四節更深入探討七十年代以來達爾的民主新思考，分析的焦點放在他對「政治不平等」的批判，以及他的「經濟民主」改革方案。本文所提出的另類觀點是：「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乃是貫穿達氏民主思想三個不同階段的一條主軸；達爾的「去中心化」主張自五十年代起轉而連繫上了熊彼得的競爭式精英民主理論，從而開創出一套以「多元競爭」為核心思考的多元民主典範；而七十年代以來達爾對政治不平等的批判，以及他的經濟民主方案，必須理解為對上述兩項基本主張(「去中心化」和「多元競爭」)的進一步發展與深化。依作者之見，吾人唯有從此一角度才得以更適切地掌握達氏民主思想六十年來的變與不變。

*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使原稿中的疏失得以修正。本文原稿曾於八十八年十月七日中研院社科所歷史與思想組的研討會中宣讀，多謝張彬村、錢永祥、林天河三位教授的指正，以及其他與會者的參與。又郭秋永、徐火炎、張福建三位教授閱讀原稿，並提供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關鍵詞：民主；多元民主；多元政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平等；
經濟民主

壹、「問題學者」達爾及其相關爭議

羅伯·達爾（Robert A. Dahl）毫無疑問是當代最著名的民主思想家，同時也因其名氣和影響力而成為一位備受爭議的「問題學者」。本文的目的在於重新詮釋達氏民主思想從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三階段發展，並提供一個與其他版本有所不同的「另類觀點」。

達爾以「多元民主」（polyarchal/pluralist democracy）典範揚名立萬，他的名著如《民主理論序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1956）和《誰治理？》（Who Governs？）（1961）等早已登入政治學經典之殿堂，而為全球政治學界所耳熟能詳。這些五、六十年代的論著奠定了達爾崇高的學術地位，但卻也因此使得他成為一波又一波非主流派批評者的眾矢之的。隨著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學生運動以及歐美新左（the New Left）運動的水漲船高，達爾的多元民主典範被泛左派知識份子斥為一個不具批判性格、維護既得利益的意識型態。在本質上，這當然是一場學術與政治糾纏不清的混戰，但倒也促成了不少重要的學術爭議，如關於「權力的一個、兩個或三個面向」、「規範性 vs. 經驗性民主理論」、「古典/參與民主 vs. 多元/精英民主」、「寡頭或階級宰制 vs. 多元社會」等等¹。不過就當批評者還意猶未盡之時，達爾卻悄悄地（自七十年代初起）進行了一系列的自我修正。及至八十年代，這些大幅修正開始受到廣泛注意，學界間「兩個達爾」（two Dahls）的說法不脛而走（Shapiro and Reeher, 1988: 2）。

自七十年代起，達爾致力批判當代西方民主體制中種種政治資源分配不均和「政治不平等」（political inequalities）現況；在一系列的著作中，他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乃是政治不平等的一大根源，而根本的解決之道將

¹ 關於「權力面向」的討論，請參見 Bachrach and Baratz (1962)、Lukes (1974)、Isaac (1987)，中文部分請見郭秋永教授（1995；1998a）。關於「規範性 vs. 經驗性民主理論」和「古典/參與民主 vs. 多元/精英民主」，請見郭秋永（1991；1998b）、Bachrach (1967；1971)、Dahl (1966)、Duncan and Lukes (1963)、Pateman (1970)、Skinner (1973)、Walker (1966)。關於「寡頭或階級宰制 vs. 多元社會」，請見一般性政治社會學讀物，不另羅列。

在於創造一個以自治企業 (self-governing enterprises) 和合作所有制 (cooperative ownership) 為主體之「經濟民主」 (economic democracy) 新秩序 (esp. 1985)。此外，他指出美國的憲政體制從一開始即是為了維護少數人的既得利益而設計，時至今日業已構成了民主改革的一大障礙，同樣必須加以匡正。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七十年代以後的達爾不但難以稱得上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者，反倒可以視為美國資本主義的顛覆者，也無怪乎不少以「美國經驗」自豪的人士要對他大肆抨擊了 (e.g. Ceaser, 1990: ch.6)²。

根據筆者的理解，關於達氏民主思想的發展和轉折，至少計有下列幾大類的詮釋：埜「兩個達爾」：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達爾的前後期思想有某些明顯的差異，也有論者更進一步把五、六十年代達爾的多元民主典範歸類為「古典多元主義」 (classic pluralism)，而將他七十年代末以來的觀點稱為「新多元主義」 (neo-pluralism) (esp. Held, 1996: ch.6; cf. McLennan, 1989: ch.2; cf. Manley, 1983)³；埜「一個達爾」：在一九八七年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中，達爾的學生伊塞克 (Jeffrey C. Isaac) (1988) 斷言他的老師始終是一位「民主的社會主義者」 (democratic socialist)，而羅威 (Theodore J. Lowi) 則認為達爾從來就是一位「隱密的自由主義者」 (closet liberal) (Shapiro and Reeher, 1988: 157)；埜大師的自白：在同一個研討會中，達爾不但不同意上述所有說法，對於諸如「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等所有意識型態的「標籤」都感到難以消受 (ibid.: 2, 158-9)。

由於達爾的民主思想在七十年代前後確有一些非常顯著的轉變，我們首先必須質疑上述的第二類和第三類詮釋。達爾的自白無助於吾人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發展與轉折，因此可以存而不論；事實上，他雖不同意「兩個達爾」的說法，但也並未否認他的思想重心的確有所轉變 (ibid.: 2, 156)。至於伊塞克的解讀則似乎太過牽強，因為他亦承認在五、六十年代達爾的著作 (如《民主理論序言》和《誰治理？》) 中，實在找不到任何顯著的社會主義成份 (1988: 140)。羅威的說法涉及「自由主義」一詞到

² 達爾的自我修正在 Dahl (1970) 已可初見端倪，並陸續發展於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文字，後收錄在 Dahl (1986) 論文中。更成熟的觀點可見於 Dahl (1982; 1985; 1989; 1990; 1998)，而以 (1985; 1989) 最為重要。

³ 中文部分請參見徐火炎教授 (1998) 對「新多元主義」的相關討論。

底該如何定義的棘手問題；就算達爾果真是吾道一以貫之的「隱密的自由主義者」，這種籠統的說詞也還是無助於釐清他的思想面貌。

至於上述的第一大類詮釋，雖然都注意到了「兩個達爾」之間某些明顯的差異，但往往霧裡看花，並未能更貼切地掌握達氏前後期思想的變與不變。如果「兩個達爾」真的可以詮釋為兩種多元主義，那麼這兩種多元主義到底有何差異呢？最為明顯的差異無疑是達爾自七十年代以來的反資本主義立場，而這遂使得不少評論者強調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讓步」（e.g. Held, 1996: 214; cf. McLennan, 1989: ch.2）。另有論者如曼力（J. F. Manley）（1983）指責達爾的讓步「還不夠」⁴；而伊塞克（1988: 144）（雖不同意「兩個達爾」的說法）亦同樣主張達爾應該進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事實上，達爾不但從來就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說是出之於與馬派論述全然不同的另一套思考邏輯，根本無所謂讓不讓步可言。

為求釐清「兩個達爾」的同異，筆者認為吾人有必要更深入地分析他的「經濟民主」改革方案及其獨特的思考進路。評論者（包括上述持「讓步」說的論者）多半把七十年代以來達爾的「經濟民主」方案僅僅當作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負面批判，而忽略其積極正面的理論內含。但後者卻似乎正是解題的一大關鍵。達爾自七十年代起不但痛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端，而且主張以合作所有制和自治企業取而代之；這套改革方案是當代西方眾多「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模型中之一種（cf. Pierson, 1995），其與達氏民主思想的關聯性亟待釐清。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正是達爾在他的早期（四十年代）著作中所關切的主題。因此，在眾說紛紜的「兩個達爾」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鮮為人知、乏人問津的青年達爾，亟待更深入的討論。達爾的詮釋者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e.g. Isaac, 1988），多半「省略」他的早期著作不談。在本文中，筆者亦將嘗試彌補此一缺憾。

本文將提供一個與前述各種版本有所不同的「另類觀點」，以期能更深刻掌握達氏民主思想六十年來的發展與轉折、變與不變。第二節將回顧達爾的四十年代舊作，檢視其幾項核心主張如「市場社會主義」、「權力

⁴ 另見 Dahl（1983）和 Lindblom（1983）對 Manley（1983）的回應。

與控制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control)、「工作者對產業的民主控制」等等。青年達爾自許為一位「民主的社會主義者」，而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於他的「去中心化」思考。達爾致力批判當時其他各股社會主義思潮的中央集權傾向，並特別強調「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之重要性；他認為最能夠實現此一目標的經濟體制既非資本主義亦非蘇聯式計畫經濟，而是一種結合了市場機制和公有制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

隨著冷戰體制的確立，達爾放棄了社會主義，轉而投入美國多元政治之研究；但他並未因此放棄他的「去中心化」思考。在五、六十年代達爾的名著中，「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彷彿成了對美國民主經驗的一種科學描述；按照他的說法，多元權力之間的相互競爭與制衡（在美國）業已創造出了一個新的「多元民主」模式。在本文的第三節中，筆者將申論達爾的「多元民主」典範乃是對熊彼得（J. A. Schumpeter）所倡議之「競爭式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修正，而這將是了解達氏思想的另一個重要關鍵。

在本文的第四節中，筆者將更深入地探討七十年代以來達爾的民主新思考；分析的焦點將放在他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政治不平等」的批判，以及他的「經濟民主」改革方案。所欲提出的「另類觀點」是：玲「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乃是貫穿達氏民主思想三個不同階段的一條主軸；達爾的「去中心化」主張自五十年代起轉而連繫上了熊彼得的競爭式精英民主理論，從而開創出一套以「多元競爭」為核心思考的多元民主典範；自七十年代以來達爾對政治不平等的批判，以及他的經濟民主方案，必須理解為對上述兩項基本主張（「去中心化」和「多元競爭」）的進一步發展與深化。依筆者之見，吾人唯有從此一角度才得以更適切地掌握達氏民主思想六十年來的變與不變。

貳、青年達爾論「民主的社會主義」

達爾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間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社會主義綱領與民主政治」（Socialist Program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隨後把它分為三篇文章陸續發表於四一與四七年。這些塵封已久、鮮為人知的舊作直到八十年代才重見天日，刻意地收錄在他的《民主、自由與平等》（Democracy, Liberty,

and Equality) (1986) 論文集中，以作為了解他個人思想晚近發展（尤其是「經濟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線索。遺憾的是，這些重新出版的舊作並未在西方學界受到廣泛的重視。

自二〇年代末起，資本主義經濟的空前危機使得不少西方知識份子把社會主義（用「公有制」和「計畫」去取代「私有制」和「市場」）視為唯一的出路。約翰·杜威（John Dewey）是在新政（New Deal）時期的美國大力鼓吹社會主義變革的一位著名人物⁵，而經濟學家熊彼得（1943: 409）則認為社會主義「將無可避免地來臨」。這是海耶克（F. A. Hayek）（1944）筆下的「到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但當時卻有更多人相信海耶克式的自由經濟早已徹底破產，而社會主義也未必是一條通往極權統治的「到奴役之路」⁶。論者如熊彼得（1943: Part IV）認為官僚化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已是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並預言社會主義將是此一歷史趨勢下的必然產物；但他相信在先進的西方社會中，民主政治（多黨競爭）和社會主義經濟（公有制計畫經濟）其實是可以相容的。

青年達爾並不同意熊彼得的看法。他認為公有制計畫經濟並不是唯一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而官僚化和集中化也不是什麼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再者，他相信任何中央集權的體制（如公有制計畫經濟）都是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的。對青年達爾而言，一個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反官僚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不但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論民主的社會主義之理論》（On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1986: ch.1）一文中，他檢討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種種爭議，並首度提出了上述之個人觀點。

要了解青年達爾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下三〇年代的「社會主義計算」（socialist calculation）大辯論。海耶克在一九三五年編輯出版了《集體經濟計畫》（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1935）一書以質疑公有制計畫經濟的可行性，旋即引爆了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大辯論。以米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為首的奧地利學派認為：由於市場和價格機制的闕如，理性的經濟計算在公有制計畫經濟中乃是不可能的；易

⁵ 參見 Anderson (1992: 89-90)。

⁶ Cf. Hobsbawm (1991) 和 Polanyi (1957) 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另參見 Bottomore (1985; 1990) 對相關辯論之介紹。

言之，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從當時學界的反應來看，海耶克等人公認為是那場辯論的輸家，脫穎而出的則是奧斯卡·蘭（Oskar Lange）的「市場社會主義」論證。社會主義者奧斯卡·蘭試圖說明理性的資源分配和經濟計算在一個公有制計畫經濟中是可能的；他的主要論點是：雖然真正的市場不復存在，但「中央計畫局」仍可以利用某種「仿市場」（simulated market）的設計去達成理性計算的目的⁷。奧斯卡·蘭後來公認為「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教父，但他的模型有其時代性，必須要放在三十年代蘇聯式計畫經濟的脈絡中才能理解⁸。誠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奧斯卡·蘭的「仿市場」充其量不過是一套「中央計畫內的去中心化程序」（decentralization procedures in central planning），憑藉這套程序其實並不足以帶來一種（青年達爾所憧憬的）在本質上與蘇聯模式完全不同的「市場社會主義」新模式（cf. Nuti, 1992: 20）。

儘管如此，青年達爾（1986: ch.1）相信奧斯卡·蘭的論證一則有效地駁斥了奧地利學派的說詞，另則暗示著一種完全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市場社會主義」新模式。達爾認為蘇聯模式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它缺乏經濟理性，而在於它徹底地壓抑、取消了市場機制，從而使得政經權力高度集中在國家官僚的手中；這種中央集權的體制斷送了政治民主、剝奪了消費者選擇消費品的自由、犧牲了工作者對產業的民主控制，因此完全與他的民主信仰背道而馳。依達爾之見，一個有別於蘇聯模式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政治面上必須保留西方既有的代議民主實踐，在經濟面上則必須是一種結合了公有制和市場機制的「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假設是：市場機制的自主運作（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將能夠有效地抑制政經權力集中化的趨勢，促成「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control）（ibid.: 54），從而使得政治民主、產業民主、消費者自由、地方自主、多元結社等目標之實現成為可能。

青年達爾（1986: ch.3）所關切的另一個主題是英國工黨內部「費邊社會主義者」（Fabian socialists）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guild socialists）間之爭議。儘管柯爾（G. D. H. Cole）等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工黨內的失勢

⁷ 關於「社會主義計算」大辯論的文獻繁多，請參見 Lavoie（1985）、Bottomore（1990）和 Roemer（1994）。

⁸ 關於時下西方的許多「市場社會主義」方案，另見 Pierson（1995）。

已成定局，達爾對他們的許多觀點如「工作者對產業的民主控制」深表同情。按照達爾的陳述，費邊主義的勝出代表著傳統英式議會主義、「共同體」（community）和「中央計畫」的決定性勝利，被犧牲的則是利益團體、地方自主、和工作者對產業的民主控制。於是他問：難道共同體對經濟的集體控制一定要以犧牲工作者的尊嚴為前提嗎（*ibid.*: esp. 98-100）？

達爾（1986: ch.2）不但質疑英國工黨的中央集權傾向，更進一步挑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和諧」（social harmony）的想像。依達爾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錯誤地相信階級矛盾的消失將帶來一個「和諧」的社會，以至於忽略了代議民主制度（多數統治、多黨競爭、基本公民與政治自由等等）的必要性。對他而言，政治和社會衝突不但將持續存在於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更必須用「民主」的方式去解決，任何「政治終結」的想法都是極為危險的⁹。在此，「民主」一詞所指的並不是一個「和諧」的民主共同體，而是西方既有的代議民主實踐；後者是「民主的社會主義」之基石，而非障礙。

從上述分析中浮現出了達爾晚近之「經濟民主」思想的許多重要質素，但最值得強調的莫過於他的「去中心化」思考。在青年達爾的著作中，「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此一主張所欲挑戰的對象包括了所有壟斷性的、一元化的、過度集中的政經權力；然而不幸的是，這種另類思考卻剛好與三、四十年代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央集權走向背道而馳。冷戰體制的確立以及戰後凱因斯主義經濟管理的成形，最後促使達爾放棄了社會主義，轉而投入美國多元政治之研究；但顯而易見，他並未因此而放棄他的「去中心化」思考。不過「社會主義」從此在他的著作中消聲匿跡，及至七十年代起才以「經濟民主」為名重見天日。

參、從「競爭式精英民主」到「多元民主」

「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是青年達爾的政治希望，但在他五、六年代的名著中卻彷彿成了對美國民主經驗的一種科學描述。由於達爾這一時期的著作已為人所耳熟能詳，筆者將不再重述其諸多論點，僅將嘗試釐

⁹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終結」論，另見 Polan（1984）和 Held（1996: ch.4）。

清其與熊彼得的「競爭式精英民主」理論之間的內在連繫¹⁰。依筆者之見，達爾的「去中心化」主張自五十年代起轉而連繫上了熊彼得的民主理論，從而開創出一套以「多元競爭」為核心思考的多元民主典範。

達爾的「多元民主」或「多元政治」(polyarchy)典範最早出現在他與林布朗(Charles E. Lindblom)合著的《政治、經濟與福利》(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1976 [1953])一書中，後進一步發展於他的名著如《民主理論序言》(1956)和《誰治理?》(1961)。這些著作中的熊彼得式觀點使得達爾(自六十年代起)被許多批評者視為一位典型的「精英民主論者」或「民主精英論者」(democratic elitist)，但他個人卻始終拒絕接受這樣的定位。許多的六、七十年代的口水戰環繞在「民主精英論」這個標籤上，至於它確切的內容為何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時至今日仍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¹¹。

熊彼得(1943)公認為「競爭式精英民主」或「民主精英論」的理論教父，也是達爾經常援引的一位作者。在韋伯的影響下，熊氏相信現代社會的發展業已使得「人民意志」、「人民主權」等等「古典」的民主理念成為迷思¹²，而現實世界中的「民主」充其量不過是選擇政治領袖、正當化其統治的一套「政治方法」或「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多元的政黨和政治精英必須透過自由的選舉競爭(一種政治領域中的市場競爭)去取得領導權，因而與一元化的專制政體有所不同；不過政治消費者(選民)的權力十分有限，在選擇政治領袖後對其

¹⁰ 「競爭式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一詞取自 Held(1996: ch.5)。

¹¹ 與此相關的文獻與討論，請見註 1，不另羅列。

¹² 何謂「『古典』民主學說」是個爭論不修的話題，這種提法的始作俑者是熊彼得(1943: ch.XXI)，也有人追溯到韋伯對熊氏的影響力。論者如 Duncan and Lukes(1963)、Pateman(1970: esp.17)、Held(1996: esp.192)等認為熊彼得忽略了其所明批或暗指的十八、九世紀作者如 Rousseau、Bentham、James Mill、John Stuart Mill.....之間的重要差異，因此杜撰出了一個名之為「古典民主學說」的稻草人。筆者傾向於支持 Miller(1983: esp.150)、Bellamy(1990: 505-506)和 Zolo(1992: 65)等學者的看法，即熊氏的陳述(儘管其問題)的確或多或少地點出了十八、九世紀論者所共有的一些規範性假設(cf. Bobbio, 1987: 27-28)。另請參考 Macpherson(1977: ch.2 & ch.3)對古典民主學說之討論，又 Held(1996: part 1)把雅典民主、共和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民主、馬克思主義直接民主同列為他所謂的四個「古典(民主)模式」。

實際政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依熊彼得之見，這種「政治市場」未必不會由「寡占」逐步走向「市場失敗」而倒退為專制（如威瑪共和），但這是一個經驗而非理論問題；在官僚化和集中化的歷史大趨勢下，多元的政黨和精英競爭仍將是防範專制於未然、保障基本公民與政治自由的重要工具，不能輕言放棄（*ibid.*: esp. 269-272）。

熊彼得的「競爭式精英民主」是達爾等五、六十年代多元民主論者的一個重要參考座標；但與熊氏相較，他們對西方（美國）民主的評價顯得樂觀了許多。對熊彼得而言，在官僚化和集中化的歷史大趨勢下，「競爭式精英民主」或許是個人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達爾則更樂觀地相信多元政治精英間之相互競爭與制衡將能夠有效地「削弱」集中化、寡頭化的趨勢（*cf.* Dahl and Lindblom, 1976 [1953]: 283-284）。

熊彼得的「政治市場」所指的主要是政黨之間的選舉競爭；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幾乎註定是一種寡占市場，政治消費者在選擇政治領袖後對其實際政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達爾認為熊氏過分狹隘地把政治競爭侷限在政黨政治的領域，而忽略了利益團體政治的重要性；對他來說，多元利益團體間之相互競爭與制衡才是了解（美國）多元政治的最主要關鍵。呼應了熊彼得的說法，達爾指出選舉對於實際政策的影響力極為有限，而所謂的「多數意志」因此不過是毫無經驗根據的迷思；然而選舉和政治競爭卻具有熊彼得所忽略的一項重要功能，即迫使政治領袖將多元利益團體之種種訴求與偏好納入政策考量（*esp.* 1956: 131-132）。在這樣一個高度「去中心化的系統」中，非領導者對領導者及其決策具「（相對）高度的控制力」，而領導者對非領導者的喜好則具「高度的反應力」——正彷彿是一種體質優良的完全競爭市場（*ibid.*: 150, 3, 132; *cf.* Dahl and Lindblom, 1976 [1953]: 175, 284）。多元民主的本質乃係一「多元的少數之治」（*minorities rule*），任何一個活躍和正當的團體之訴求在決策過程的某個階段都會被納入考量，而層級化和寡頭化的趨勢也因此得以受到抑制（*esp.* 1956: 150）。從這個角度來看，熊彼得的悲觀論調終究是難以成立的¹³。

儘管這些重要的差異，達爾的多元民主典範可以說是對熊氏觀點的一

¹³ Dahl and Lindblom (1976 [1953]: ch.10 & ch.11) 是值得注意的兩個章節，更細緻地討論了 Dahl (1956) 的許多著名論點。關於達爾與熊彼得的「政治市場」假設，另見 Macpherson (1977: ch.4) 和 Zolo (1992: ch.3)。

個發展和修正，而非否定。從五三年的《政治、經濟與福利》（1976 [1953]: e.g. 283-284）一直到九八年的《論民主》（On Democracy）（1998: 113-114），達爾一再地援引熊彼得的「競爭式精英民主」觀點以駁斥米修（Roberts Michel）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他不厭其煩地重申：多元政治與寡頭政治之不同並不在於政治領導（political leadership）之取消，而在於多元的政治領導者間之相互競爭與制衡。由是觀之，達爾似乎真的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熊彼得式的「民主精英論者」，儘管他個人對此「標籤」之濫用深表不滿（esp. 1966）。

根據郭秋永教授（1991: 364）的研究，「在所有被列舉為民主精英論者的當代政治學家中，唯有達爾一人曾經撰文否認過」。在一九六六年的一篇回應文字中，達爾（1966: 113, 103）強調批評者誤將「經驗性」的多元民主論視作「規範性」思考，並申明他從不認為政治冷漠的現象是可喜的；此外，他試圖根本否定「民主精英論」這個典範的存在。達爾對於「民主精英論」一詞中的「精英」二字向來語多不滿，唯恐他人把熊彼得式的多元競爭觀點與米修、柏烈圖（Vilfredo Pareto）、莫斯卡（Gaetano Mosca）、米爾士（C. Wright Mills）等人的「少數宰制」（minority domination）理論混為一談。對他而言，「多元的少數之治」與「少數宰制」有本質上的重大差異；前者並不構成一種宰制，反而正是一種反宰制、反寡頭的政治邏輯（cf. 1957; 1982: 32-36; 1986: 232; 1989: ch.19）。其實，大部分評論者並沒有刻意地混淆上述兩個典範之區別；而達爾似乎也肯定了他的多元民主論乃係對熊氏觀點的一個發展（cf. Sartori, 1987: ch.6）¹⁴。

許多六十年代「民主精英論」的批判者斥其為一個維護現狀和既得利益的意識型態；這樣的指控或許有欠公允，但也不全然是無的放矢、空穴來風的（cf. Walker, 1966; Bachrach, 1967; Pateman, 1970）。五、六年代的「民主精英論者」如達爾和林布朗（e.g. 1976 [1953]: 280-282, 315）的確明白地點出了許多政治不平等狀況的存在，但在他們的「經驗性」論述中這些現象卻彷彿不具任何特別的重要性——對一個體質優良的政治市場之讚嘆似乎超過了其他考量。誠如郭秋永教授（1991: 363）所指出的：「民

¹⁴ 另一位著名的「民主精英論者」Sartori（1962; 1987）則向來強調他自己與達爾的民主理論同為對熊彼得（1943）觀點的進一步發展。

主精英論不但意含我們應該放棄古典理想，並且隱含英、美公民正生活在一種可欲的系統中，而毋須正視其大量低社經地位者的『缺憾』情況。換句話說，民主精英論肯定『民主系統』的穩健運行，遠優於『典型公民』的積極孕育。當將『政治權力人人平等』闡釋為『政治權力應該人人平等』時，民主精英論者認為它是一項不值得追求的、可能破壞系統穩定的理想」。對於許多批評者而言，達爾的「民主精英論」正是這樣一種不具批判性格、漠視政治不平等、維護既得利益的意識型態。

然而，自七十年代起，達爾展開了一系列的自我修正；他不再相信「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已經或多或少在美國實現，並且開始大力批判當代種種政治不平等現況和寡頭趨勢——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對於社經乃至於政治資源分配的嚴重扭曲。這些大幅修正使得「兩個達爾」的說法不脛而走（詳見第一節），但值得強調的是：七十年代以來的達爾既未放棄對「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之堅持，其實也並沒有放棄以「多元競爭」為核心之多元民主典範。在下一節中，筆者將進一步檢視七十年代以來達爾的民主新思考，並嘗試釐清他的「變」與「不變」。

肆、從「政治不平等」到「經濟民主」

早在五三年的《政治、經濟與福利》一書中，達爾與林布朗即已點出了種種「政治不平等」的存在；他們甚至自問「多元政治」（polyarchy）到底可不可以算是一種「民主」（democracy），因為領導者與非領導者對於決策的不平等控制乃是不爭的事實（1976 [1953]: 284, 275）。儘管如此，他們拒絕接受「政治權力應該人人平等」這類規範性的民主思考，斥其為「所有人類目標中最烏托邦的目標」（Dahl, 1958: 465）¹⁵；如果古典的民主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差距太大，那麼一定是那些不合時宜的理想出了問題，必須修正以符應美國的政治現實¹⁶。

自七十年代起，達爾不再拒斥規範性的民主思考；不但如此，他近年

¹⁵ 此一翻譯取自郭秋永教授（1991: 354）。

¹⁶ 關於五、六年代的多元/精英民主論者到底是如何看待「政治平等」，其與古典/參與民主論者的看法又有何不同，請參見郭秋永（1991）、Bachrach（1967: ch.6）和 Pateman（1970: ch.1）。

來還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提出了一個「強平等原則」(the Strong Principle of Equality)以作為「政治平等」的倫理基礎(esp. 1989: ch.7)¹⁷。達爾(自七十年代末起)把「政治平等」定義為「一個理想的民主過程」,其五項判準為:令每個成員的有效參與;投票等值;令每個成員對議題之開明的了解(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姓 the demos 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妹 the demos 除非特殊例外應包括其統轄內之所有成人(cf. 1982: 5-7; 1985: 59-62; 1986: ch.6 & ch.8; 1989: ch.8 & ch.9; 1998: ch.4)¹⁸。批評者或許會認為這些判準所要求的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formal)政治平等,因此與五、六十年代民主精英論者的立場無異,但實則不然:「當政治資源(political resources)的差異造成公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那麼這種不平等必將違逆上述判準而自動暴露出來」(1985: 60)。換言之,所有「政治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都在達爾的批判之列¹⁹。

五、六年代的達爾把他的多元民主典範包裝為一個經驗性的民主理論,並且暗示「民主」已經或多或少在現實中兌現;七十年代以來的達爾拋棄了他先前對美國民主過分樂觀的評價,並進而提出一套高標準的「政治平等」理想(ideal)以作為評量、批判和改造現實的道德指南。由於此一崇高理想的完全實現不是一蹴可幾的,達爾認為民主人士的首要目標將在於有效地削減實存的「政治不平等」;他指出當代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造成了社經資源乃至於政治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均,正是政治不平等的一大(雖絕非唯一)根源。為求正本清源,他提出了一個名之為「經濟民主」的社經改造方案,主張以合作所有制(由工作者共同擁有、民主自治之企業體所構成的經濟秩序)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對於所有其他的資源重分配方案而言,此一方案被認為是最有效、最無不良副作用的一個(esp. 1985; cf. 1982: 197-205; 1986: 146-148; 1989: 324-328; 1990: ch.4)。他並且指出,民主自治雖未必適用於所有的社團組織,但完全可以適用於今日歐

¹⁷ 受限於篇幅,本文無法進一步說明達爾在這方面的思考,有興趣者請見 Dahl(1989: ch.6 & ch.7; 1998: ch.6 & ch.7)。

¹⁸ Dahl(1989: part 3)詳盡地討論了這五項判準的具體內容。

¹⁹ Dahl(1998: 177)把「政治資源」界定為憑藉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人行為的所有可用之物;這不是個內容固定的範疇,但在現代社會中大致包括了諸如財富、收入、暴力、地位、特權、知識、教育、資訊、組織、傳媒等等。

美的經濟企業；從規範性思考的角度，他更進一步申論經濟企業「應該」由工作者共同管理、民主自治，並以專書駁斥反對者的各種說詞（1985: esp. ch.4; 1989: 328-332）。此外，他指出美國的憲政體制業已淪為少數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對民主改革構成了一大障礙，同樣必須加以匡正（1982: 189-193; 1986: 148-149; cf. 1956: 30; cf. 1981: ch.5）²⁰。

上述等主張不但使得「兩個達爾」的說法甚囂塵上，更有不少論者相信七十年代以來的達爾業已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重大的「讓步」（見本文第一節）。若依筆者之見，達爾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乃是出之於與馬克思主義全然不同的另一套思考邏輯，無所謂讓不讓步的問題。為求釐清達爾的立場，我們有必要更進一步分析他的「經濟民主」改革方案及其獨特的思考進路。

首先，達爾從不認為他所倡議的「經濟民主」與西方的代議民主制度有任何相互牴觸之處。按照他的陳述，「現代代議民主的政治制度」（代議士及官員之選舉、自由公平經常之選舉、言論資訊集會結社等自由、擴及所有成人之普遍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等）是所有「大規模（large-scale）民主」（即現代國家規模下的民主）所必須採取的政治制度。他強調：如何在現代國家的規模之下實現「民主」是所有民主人士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基於「規模」和「參與程度」成反比的經驗原則，他重申代議民主制度的現代性，並反對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烏托邦（1989: esp. 215-222; 1998: 85-90; cf. Dahl and Tufte, 1973）²¹。

再者，達爾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不但造成了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均，也

²⁰ 本文無法進一步討論達爾對美國憲政體制的種種批判，相關爭議請見 Riley（1990）和 Ceaser（1990: ch.6）。

²¹ Cf. Bobbio（1987: ch.2）對「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之相關討論。許多民主人士雖未主張以直接民主全盤取代代議民主，但卻仍憧憬一種在政治參與程度和品質上的大躍進；論者如佩特曼（Carole Pateman）（1970）即從此一角度為自治企業之主張辯護，視其為造就「積極公民」的民主搖籃。達爾對此願景表示同情和樂見其成，但強調企業自治並不是萬靈丹，未必就能夠大幅提昇政治參與的程度和品質。對他而言，這一切還有待進一步的實驗和觀察（1985: 94-98, 133-134, 152-153）。關於達爾對政治參與的看法，請見郭秋永教授（1998b: esp. 37-49）詳盡的分析說明。

因此助長了權力集中化和寡頭化的趨勢。此與「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之目標可謂背道而馳 (cf. 1986: 148)。事實上，資源重分配的方法很多，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型也不少 (cf. Pierson, 1995; Roemer, 1994)；若非對「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之堅持，我們將難以理解為何達爾既不將就官僚化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也不青睞公有制的市場社會主義（如青年達爾之主張），而偏偏選擇了當代諸多市場社會主義模型中最「去中心化」的一個（即「自治企業」加上「合作所有制」）。達爾指出社會民主福利國家在美國的實驗早已失敗，在北歐則走到了盡頭，時至今日唯有所有制的變革才是根本解決之道；然而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顯示，「國有制」以及地位曖昧不明的「公有制」和「社會所有制」必須加以避免，與國家劃清界線的「合作所有制」或許才是最佳的選擇 (esp. 1985: 140-152; cf. 1982: ch.6)。所謂「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之於達爾的重要性，在此可說已再度表露無遺。

達爾的經濟民主方案遙呼約翰·密爾 (John Stuart Mill) (1987) 的社會合作思想，在過去向來被主流的社會主義者斥為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其公認之罪狀在於迷信市場機制、漠視「市場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 of the market) 等等。但曾幾何時，隨著東西方官僚國家的不斷膨脹，這種非主流的社會主義思考又再度自六十年代起浮上了檯面 (cf. 1982: 126-133)。面對上述等指控，達爾強調他的經濟民主方案與密爾等人之主張不同，因為國家仍將在以自治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社會中扮演調節和資源重分配的要角，以避免所謂「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及其惡果。不過他相信：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均助長了官僚化的趨勢，而資源分配相對平均的合作所有制至少將能夠緩和此一趨勢 (1985: 100-101, 104-108)。

不少批評者認為達爾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忽略了「市場」本身即是一大「不平等」之來源，而更平等的資源分配唯有透過國家行動為之；與「合作所有制」相較，「國有制」、「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將為國家介入預留更多空間，也因此更能達成資源重分配的目標 (cf. 1982: 120-126; 1985: 142-150)。針對這種說法，達爾指出許多以追求平等、消除「市場的無政府狀態」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最後卻帶來了國家壓迫和更大規模的政治不平等，而這些教訓正說明了官僚國家本身即是政治不平等的一大根源。依達爾之見，所有集中化的權力如官僚國家和大型私有企業都是政治

不平等的最直接來源；合作所有制是在這個考慮下的一項主張，雖註定無法消弭政治不平等的所有來源，但或許是種種客觀條件下的最佳選擇（esp. 1989: 323; 1982: 202-203）。

七十年代以來的達爾不但依然堅持「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之重要性，其實也絲毫沒有放棄以「多元競爭」為核心之多元民主典範。達爾（1998: 113-114）指出：「多元的政治與官僚精英間之議價」（bargaining among political and bureaucratic elites）雖自有一套相互制衡的邏輯，但的確是當代多元政治的「陰暗面」（the dark side）；不過此與寡頭宰制仍有所不同，不能混為一談。再次援引熊彼得，達爾（esp. 1989: ch.19; 1982: 32-36）重申他對左右兩翼「少數宰制」論之反對：不但米修的「寡頭鐵律」既不鐵也不律，馬派的資產階級宰制論也完全不能成立；這些理論的唯一用處在於指出當代多元政治中大規模政治不平等之存在，對於如何推動改革卻毫無助益可言。對達爾（esp. 1982）來說，當代多元政治的種種困境並非源自其「多元競爭」之性格，而係源自於大規模政治不平等之存在；他的改革方案是為了削減政治不平等而設計的，不但絲毫沒有違逆多元民主之基本理念，反而正是在不同的現實條件下對它的一種「趨近」（approximation）。

呼應了他早年對馬克思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的批評，達爾強調他所倡議的「經濟民主」將不會帶來一元化的社會和諧，也「不會消弭公民之間種種衝突的利益、目標、觀點與意識型態」（1985: 110）；正好相反，這樣一個相對平等、相對去中心化的社經體制將更進一步深化社會與政治的多元性格。他重申：在現代社會中，所謂的「公眾」（the public）經常是「由許多不同的分眾（many different publics）所組成的」；多元團體之間的相互競爭，再加上「權力的去中心化」，將能使「不同分眾中之公民的不同利益被賦予或多或少的平等考量」；而「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公眾之善（the public good）將能在一個多元民主中達成」（1989: 295, 252; cf. Hirst, 1994）。這無疑是「兩個達爾」之間的共同堅持；而我們也唯有從這個角度才能完全理解達爾自七十年代以來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政治不平等的批判，以及他的經濟民主改革方案。

伍、代結論

透過前三節之逐步分析，筆者提供了一個解讀達爾思想發展的「另類觀點」如下：玲「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乃是貫穿達氏民主思想三個不同階段的一條主軸，這項主張早在四十年代即已具體呈現在他的博士論文《社會主義綱領與民主政治》中；麥達爾的「去中心化」主張自五十年代起轉而連繫上了熊彼得的競爭式精英民主理論，從而開創出一套以「多元競爭」為核心思考的多元民主典範；而七十年代以來達爾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政治不平等的批判，以及他的經濟民主方案，實乃對上述兩項主張（「權力與控制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競爭」）的進一步發展與深化，而非放棄或否定；被拋棄的是他先前對美國民主過分樂觀的評價，不變的則是多元民主之基本理念。筆者相信此一「另類觀點」將有助於吾人更適切地掌握達氏民主思想六十年來的變與不變，並且避免了本文第一節所批評的種種以偏概全的詮釋途徑。下面簡要的補充說明將無礙「另類觀點」之成立與否，僅代表個人對達氏思想的一些初步反省與批評。

達爾的同事林布朗（1977: 168-169）曾經一度指出：「多元政治之所以和市場系統（market system）相結合，或許並不是因為市場系統是民主的，而正因為它不是」。易言之，「多元」或許不過是一種表象，掩飾了市場系統種種不民主的現實面以助其運行，也因此阻礙了進步的社經變革。在《多元民主的困境》（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1982）一書中，達爾頗具系統性地考慮了此一準馬克思主義式的論點，但卻未做出任何具體的「讓步」；簡單地說，他認為當代多元政治的困境並非源自其「多元」之性格，而源自於其他因素，如造成大規模政治不平等的資本主義財產關係（esp. *ibid.*: 53, 166-167）。

依筆者之見，達爾正確地拒絕了問題重重的馬克思主義論點，但他的立場卻不無可議之處。按照達爾的多元民主「理念型」（ideal type），「不同分眾中之公民的不同利益將被賦予或多或少的平等考量」，而「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公眾之善將能在一個多元民主中達成」（1989: 295）；再者，如果這個「理念型」未能在現實中完全兌現，那麼原因必定在於種種「外力」（如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對它的扭曲（1982: 166-167）。由是觀之，上述「理念型」之於達爾的重要性就好比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對自由市場之信仰——現實中再多的「市場失敗」亦難以搖撼之。

事實上，如筆者在前一節的開頭已指出的，達爾與林布朗早在五三年

即自問到底「多元政治」可不可以稱得上是一種「民主」；因為多元政治雖號稱是反寡頭、反層級的，但在現實中的確與廣泛的政治不平等「糾結」在一起。這些政治不平等的規模、幅度和嚴重性更直接地反映在達爾和林布朗（1977; 1988）後來的自我修正中，不禁令人懷疑（也令林布朗懷疑）所謂的「多元民主」到底有多民主、多反寡頭？義大利的民主思想家諾貝托·波比歐（Norberto Bobbio）是備受達爾推崇的一位作者；若按照波氏的說法，多元政治雖與專制政體有本質上的重大差異，但實難以稱得上是反寡頭的，而與種種寡頭趨勢難分難解地糾結在一起。易言之，波氏認為實存的政治市場本來就是種寡占市場，而這似乎也暗示著達爾的「理念型」從一開始就是「有所偏執的」（biased）（Bobbio, 1987: esp. 30-31; cf. Zolo, 1992: 109-114）²²。

在他集畢生學養之大作《民主及其批評者》（*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中，達爾更認真地考慮了波比歐式的觀點，但最後並無願調整他自己的立場（1989: esp. 336-341）。事實上，波比歐和達爾的民主理論同為對熊彼得的「競爭式精英民主」典範的進一步發展，不同之處在於波氏繼承了熊彼得的悲觀論調，而達爾則更樂觀地相信多元競爭（在理想的情況下）將能夠有效地「削弱」權力集中化和寡頭化的趨勢。依筆者之見，波比歐的現實主義論述（儘管另有種種問題）正好襯托出了達氏民主思想的理想主義色彩；這種理想主義一則呈現在五、六十年代他對美國民主高度樂觀的評價，後來則具體表現為對一個經濟民主新秩序的憧憬，兩者可謂是同一個銅板的正反兩面。

達爾從不諱言他的思想包含了許多烏托邦的質素，大者如「經濟民主」之主張；但他強調後者並非不著邊際的空想，而已將種種現實條件納入考量。達爾的經濟民主方案是「現實主義式的」，因為它的運作邏輯（市場競爭、代議民主、國家調節等等）幾乎與實存的資本主義體制無異，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自治企業」和「合作所有制」；即因如此，這個模式在過去向來不被認為是一種社會主義，甚至被形容為勞資一體的「工作者的資本主義」（workers' capitalism），而批評者亦難以用批判蘇聯模式的那

²² 筆者不完全同意波比歐的看法，並在一篇尚未發表的文字中批評了他的上述論點及其立論基礎。

套說詞去質疑它的「可操作性」²³。在另一方面，達爾(1982: 186, 204; 1985: 125-128, 160) 強調經濟民主唯有透過「激烈的政治衝突」才能達成，並不時援引瑞典和丹麥左翼社會民主(left social-democratic)運動的改革策略為例，以說明其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不過此一改革運動早已於八十年代初在北歐以失敗告終，而美國不但缺乏一個歐式的社會民主政黨，其憲政體制的設計和發展(按照達爾自己的說法)更似乎阻絕了這種政治可能性²⁴。達爾指出兩種美國夢同時存在於「我們美國人」(we Americans)的心目中，一是民主與平等的美國，另則是不斷積累個人財富的美國(1985: 162-163; cf. Bowles and Gintis, 1986)。他期盼前者終能勝出，並帶來一個經濟更民主、政治更平等的新社會，但現實卻似乎與此弘願漸行漸遠。

達爾的經濟民主方案，與其說是一套可行或不可行的政治綱領，倒不如說已再度地反映出了他對所謂「民主的理想」(the democratic ideal)之執著。時至今日，誰還能說他是一位保守的現實主義者？

²³ 這個看法當然是具一定爭議性的，不過本文無法就此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cf. Pierson, 1995: ch.6)。

²⁴ 請參見 Christiansen (1994)、Pontusson (1994) 和 Sassoon (1994: ch.23) 對瑞典與丹麥社會民主運動之相關討論。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徐火炎

- 1998 多元主義與民主政治：被俘虜的政府與民眾，收錄於蕭高彥、蘇文流主編，《多元主義》，頁 237-268。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郭秋永

- 1991 民主菁英論及其政治平等概念，收錄於戴華、鄭曉時主編，《正義及其相關問題》，頁 343-368。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1995 解析「本質上可爭議的概念」：三種權力觀的鼎立對峙，《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2)，頁 175-206。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1998a 社群權力的多元模型：方法論上的探討，收錄於蕭高彥、蘇文流主編，《多元主義》，頁 195-235。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1998b 政治參與和多元政治：理論建構上的價值問題，《行政學報》29，頁 1-60。台北：中興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二、英文部分

Anderson, P.

- 1992 "The Affinities of Norberto Bobbio," in P. Anderson,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Verso, 87-129.

Bachrach, P.

- 1967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 A Critiqu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1 *Political Elites in a Democracy*, ed.,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 Bachrach, P. and M. Baratz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942-52.
- Bellamy, R.
1990 "Schumpet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6: 500-519.
- Bobbio, N.
1987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trans. R. Griffin & ed. R. Bellamy, Cambridge: Polity.
- Bottomore, T. B.
1985 *Theories of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90 *The Socialist Econom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Bowles, S. and H.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Ceaser, J. W.
1990 *Liberal Democracy & Political Scienc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sen, N. F.
1994 "Denmark: End of an Idyll?" in P. Anderson and P. Camiller eds.,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London: Verso, 77-101.
- Dahl, R. A.
1956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A Critique of the Ruling Elite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2): 462-469.
1966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Elitist Theory of Democracy,'" collected in Bachrach (1971): 93-115.

- 1970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4th ed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1982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Response to John Manle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386-389.
- 1985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 1986 *Democracy, Liberty, and Equality*,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revised ed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 A. and C. E. Lindblom
- 1976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3,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 A. and E. R. Tufte
- 1973 *Size and Democra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G. and S. Lukes
- 1963 "The New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11: 156-177.
- Hayek, F. A.
- 1935 *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ed., London: Routledge & Sons.
-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 Sons.
- Held, D.
-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Hirst, P.

1994 *Associ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Hobsbawm, E.

1991 "Goodbye to All That," in R. Blackburn ed., *After the Fall*, London: Verso, 115-125.

Isaac, J. C.

1987 *Power and Marxist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Dilemmas of Democratic Theory," in Shapiro and Reeher (1988): 132-147.

Lavoie, D.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dblom, C.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Comment on Manle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1988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System*,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McLennan, G.

1989 *Marxism, Plural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Macpherson, C.

1977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ley, J. F.

1983 "Neo-Pluralism: A Class Analysis of Pluralism I and Pluralism I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368-383.

Mill, J. S.

1987 *On Socialis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 Miller, D.
1983 "The Competitive Model of Democracy," in G. Duncan ed.,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3-155.
- Nuti, D. M.
1992 "Market Socialism," in A. Aslund ed., *Market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31.
- Pateman, C.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C.
1995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 Polan, A. J.
1984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Pontusson, J.
1994 "Sweden: After the Golden Age," in P. Anderson and P. Camiller eds.,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London: Verso, 23-54.
- Riley, J.
1990 "American Dem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in J. W. Chapman and A. Wertheimer eds., *Majorities and Minorit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67-307.
- Roemer, J. E.
1994 *A Future fo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Sartori, G.
1962 *Democratic Theo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New York: Chatam

- House.
- Sassoon, D.
1996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London: Fontana Press.
- Schumpeter, J. A.
1943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 Shapiro, I. and G. Reeher
1988 *Power,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eds., Boulder & London: Westview Press.
- Skinner, Q.
1973 "The Empirical Theorist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Critics," *Political Theory* 1: 287-306.
- Walker, J. L.
1966 "A Critique of the Elitist Theory of Democracy," collected in Bachrach (1971): 69-92.
- Zolo, D.
1991 *Democracy and Complexity*,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Reinterpreting Dahl's Democratic Thought: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Chung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Robert Dahl's democratic thought as it has developed from the 1940s to the present. Section I reviews recent controversy over Dahl's intellectual evolution. Section II examines the young Dahl's arguments for a decentralized, democratic socialism. Section III reconsiders aspects of Dahl's paradigm of "pluralist democracy" in the 1950s and 60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Joseph A. Schumpeter's theory of "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 Section IV further explores Dahl'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inequality from the 1970s onwards, and takes a close look at his program of "economic democracy." The author argues: (1) the ideal of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control" has been the basic thread running through all three distinct stages in Dahl's intellectual evolution; (2) Dahl's model of a decentralized and pluralist democracy has been developed since the 1950s with the quintessential help of Schumpeter; (3) contrary to the prevailing wisdom, Dahl's socialistic program of "economic democracy" is intended rather as a way to realiz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a decentralized and pluralist democracy.

Key words: democracy, polyarchal/pluralist democracy, polyarchy, socialism, capitalism, political equality, economic democracy